

第三部评论

菅野敦志（名樱大学）

潘教授的报告是关于介绍“胡适档案检索系统”和“胡适藏书档案检索系统”，陈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则是关于“如何利用档案数据来看五四运动的新面貌”。聆听了两位的报告，我想用“共通化”，“多元化”，“内与外”这些视角来讨论。

首先，潘教授的报告让我们了解到两岸开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合作关系的现况。中国文学·文化改革旗手的胡适，在当下推动两岸学界之间的历史观点“共通化”及“多元化”的潮流之中，被视为是一个需要重新检讨的民国人物。有关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的角色和意义的“共通化”和“多元化”，我想请教潘教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共通化”及“多元化”的政治因素。大陆学者在改变对胡适过去的看法和评价的时候，台湾学界在进行历史观点的“共通化”与“多元化”时，台湾学界对他的看法到底有没有变化？尤其是解严后的台湾已经发生了三次政党轮替，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大陆方面合作建构胡适检索系统时，是否遭遇到困难？

第二个问题是，未来的“胡适研究”的可能性。您个人觉得今后的胡适研究重点在什么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或开拓？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在台湾 1950 年代中期，为了推行现代化，就政府是否需要再次公布简体字而引发的“简体字论战”中，虽然胡适当时居于美国不在台湾，赞成文字·拼音·国语运动改革的学者，却都试图提出胡适的意见来证明他们主张的正当性。由于胡适在改革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一直扮演了重要角色，1949 年到美国而 1958 年再到台湾的这一段期间，胡适对学界的影响，这方面是否还有研究的空间？

陈教授的精辟报告主要介绍了两个研究成果，都显示了运用 FO,CO 档案的重要性。利用这些档案数据来重新检讨英国统治下五四运动期间香港发生的情况，对了解香港所经历过的“五四”论述的复杂性有很大帮助。因为主办单位很用心地挑选“档案数据的内与外”这个主题，所以我也围绕着这个“内与外”的主题请教陈教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研究身份的“内与外”。我个人开始研究光复后台湾文化政策和语言政策时发现，身为外国学者，“外人”的身份比较容易以第三者的立场切入敏感的政治议题。如果以“内与外”作为一个关键词，在从事香港研究时的身份的“内与外”，香港学者和外国学者在什么样的领域可以发挥自己身份的特长，以避免把研究对象简单化？

第二个问题是，介绍研究成果的“内与外”。历史研究如果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而为，历史事实就会面临着被利用的危险。我个人身于日本“边陲”的冲绳，并在最“边陲”地区的大学进行研究，一直感到从少数的观点和立场看历史有益于避免毫无批判地接受大国中心史观。从少数“边陲”区域的观点来重新检讨已经成为定说的历史观的时候，为把从档案数据中得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内与外”的学者、读者，陈教授是把重心放在什么地方的？另外从“内与外”得到的反应又如何？

今年恰好是五四运动 97 周年，这个 97 的数字刚好与香港回归中国的那一年一致，是一个奇妙的偶然。第三 session 的“胡适”、“五四”、“香港”的组合，似乎存在在偶然性里面的必然性。